

抗战中的华西坝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中国大学陆续内迁到大后方，展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知识分子迁移运动。华西协合大学则从上到下担负起挽危救亡应尽的义务，敞开胸怀，“遵教育部明令，尽量收容战区学生”，迎接危难中的友校，华西坝成了各校共同的校园。

学校1937年已收30余所学校借读的学生105名。1937年11月26日医学院举行盛大欢迎中大医学院和齐大借读生大会。学生居小天竺街的东方实习学校，教职员居明德中学。农学院的畜牧系不久后也迁到紧邻华西坝的四川家畜保育所。11月25日，金陵大学教职员500人，学生300人，经重庆开赴成都，在大学路南、南台寺西及华西协中之南修建了临时宿舍，形成了宁村和金陵路宿舍区；远在山东的齐鲁大学三个高年级学生和教师，已到华西坝借读，住华美与华英舍。其余学生陷入流浪，部分也到了华西坝。刘世传回国亦到华西坝，在鲁村建立了教室与宿舍，加入联合办学。1938年1月，已被战火冲散的金女院师生在武昌和上海也难以继，遂奔向华西坝，住在女生院。此外还有东吴大学刘承钊带领的生物系20余人亦来坝上。当年秋季，各校正式对外招生，形成了五大学联合办学的格局。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入燕大校园，俘虏了燕京校内全部的美国籍教职员，逮捕了教师15人及学生11人。司徒雷登，9日返校，也遭到被捕。消息传到重庆，燕大校友群情义愤，举行大会，一致决议，后方复校。梅贻宝接任复校筹备处主任，经与四川省府联系，在陕西街租用了27和28号华美女中及启化小学，省府又将文庙拨给，迎接各地奔来的师生。当年招生报名达3000人，录取160人。以1942年10月2日到华西坝参加威尔基先生演讲为第一课。此时中大医学院已迁出。所以仍称五大学。此外1941年冬，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几位教员率10多个学生来成都，教员参加华大的教学活动，学生则与华大学生合班；协和高级护士学校则借华大医学院校地，于1943年9月复校上课。1942年，20余名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院长戈登（Gorden King）的带领下，历时5个月，终于在1942年下半年抵达成都，在华西坝注册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继续完成学业。

各校迁移，除金大及金女大部分集体转移经历艰险外，其他皆是师生个人凭着

一腔热血，几经颠沛游离，越封锁，遭匪患，饥寒交迫，步行“黄牛”兼程，历尽苦辛，才到达华西坝的。1945年抗战胜利，各校于1946年暑期陆续东归，结束了八年的联合办学，坝上开始了华大的战后篇章。

回顾八年，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赞叹不已。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都赞同燕京大学一位老师的感受：对成都燕京的回忆伴着艰辛，但也充满希望和英雄气概。最大的看点，也是战时独有的“联合办学”，历来称之曰“五大学”，不像西南联大那样被称为“联合大学”。坝上，各个不同的学校在同仇敌愆之下，聚集在一起，为在战争中保持中国高校的实力而共同努力。各校既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与完整，又资源共享；既有自己的特色，又彼此尊重包容；既有竞争，又和谐相处。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在国内的代表芳威廉博士说：在成都的五所基督教大学构成了中国此类工作中最大、最强的中心，并展示出一定程度的合作，不仅前所未有的，而且以后绝无仅有。其辉煌展现在：

首先，在战乱期间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资源，践行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任务。这时华西坝上，有文、法、理、医、农五大类专业学院，七十七个系及一些专修科，44-45年度有学生3748人，45-46年度是4675人，是战时中国学科设置最多、规模最大的大学。各校除迁来的院系外，本着服务国家的精神，还增加了一些新的系科。金女、金大、华西的学生数都超过了战前。在危难时期，培养的许多栋梁之材，在50—80年代都是各行业的翘楚，尽管不少人遭受过挫折，却都在国家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人在国际上也颇有声望。

为保持协调一致，保证教学质量，联合各方不分主客，组成联合行政例会，由各校、院负责人参加，至少每月开一次，平等协商，协调行政、财政、教职员待遇及公共事宜。虽分五校，实合作为一。教务、训导、注册亦有例会，协调授课、招考、学生训导事宜。学校采取统一安排，分别上课，教师跨校授课，学生自由选课，承认所读学分；师资和教学设备亦互通有无。三校医学院组成中大、齐鲁、华大联合医院，统一组织实习；利用人才聚集的特点，广泛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各校、院系或联合或单独举办各类学术报告、政论演讲。读书报告会、专题报告会、临床病理讨论会等等，名目繁多，学生自由参加。从课内延展到社会，从书本延展到现实。坝上各校都有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改善坝上校风，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才能的机会。

其次，践行大学关注时局的精神，投身抗战救亡。各校都重视以多种形式进行全面抗战教育。如华大校长张凌高建立了每周一上午8-9点的“总理纪念周”集会及周六的“德育会”，请中外教授，知名人士演讲三民主义、国内外形势。五大学的师生们怀着满腔热血，崇高的正义、爱国精神，既坚持教学，又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华西坝先后成立了抗敌后援分会，“华西学生救亡剧团”，五大学“抗敌宣传

第三团”，“五大学战时服务团”，“乡村服务团”等，宣传抗战，唤起民众，掀起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亲手制作冬衣，义卖献金支前，音乐会义献募捐等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五大音乐义演在成都及周边、重庆都取得巨大的成功，电台还不时播出。1939年，战时服务团邀请了冯玉祥将军来校，发表了“坚持抗战到底”的演说，激昂地号召与日寇拼个死活，当场挥毫题写了“还我山河”，深深激发了听众，许多学生把自己身上的毛衣、棉衣都脱下来捐献。1939年5月由熊德邵发起成立了五大学空袭防护大队，三百多师生参加，由中大解剖学教授张查理任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每队设三个小队，进行战地训练；还开展“伤兵之友”的慰问、服务活动。6月11日7点20分，成都遭到27架日本飞机的大轰炸，救护队起了很大作用。

1944年10月21日，国民政府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华西坝“五大学”学生踊跃报名，参加了中国驻印远征军和青年远征军。11月21日的报纸报道，金陵大学已有76名同学从军；齐鲁大学从军学生占该校三分之一，有100余位同学从军，其中有23人已赴重庆、印度受训；华大校刊载有100余位同学报名从军。燕大报名从军72人，盟国空军翻译3人，赴印、缅随军译员21人；金女40余人报名。随后政府又发出征调令，11月24日，应届毕业生集体征调赴前线服务两年。华西医牙药79名学生，集体征调从军。

第三，坚持大学探索新知，活化知识，推动学术繁荣。联合办学中，专家学者云集，生活虽然清苦，但大家枵腹从公，绝不使中国文化中辍，大力促其发展。各校或独立、或联合增设科研机构，开展广泛中外合作的学术研究。与之相应的各校除原有的刊物外还创办了一些刊物，发表研究成果。如齐鲁的《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齐鲁学报》、《中国边疆》月刊；金大的《影音月刊》、华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中国药学会会志》、《华西医讯》，与中大、齐大共办了《中华医学杂志》，金大、齐大、华大合办《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等。

《汇刊》被傅吾康认为是与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刊物同样重要。各校在独立或合作的研究上，成果累累。中国文化研究方面在相关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在国内外备受称誉的佳作；原有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以中国人为主体，在各校学者的参与下，边疆研究形成非常有特色的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华西派，英文版《华西边疆研究杂志》更是兴盛，华大博物馆也被拉铁摩尔称为“可以列入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先进博物馆的行列”。各学科都出了许多专著，皆展现了这个时期的学术繁荣。

第四，关爱社会，关爱民众，服务社会，振兴农村与边疆。开展各类社会服务是各校的传统。华大由教育系、学生自治会组织各级学生参加平民教育和平民保健服务，举办民众夜校、各类讲习班，改良茶园、厕所；成立卫生小分队，宣传卫

生，防病知识。每年暑假组织学生赴乡镇作学术演讲，调查农村经济及诊治病人。在温江建立的卫生中心，有6000多农民参加过学习。生物系改良推广奶牛、山羊，改良苹果；开展食品的保存与运输研究。金大、金女大在仁寿、华阳中和场设立乡村服务处，训练农村妇女；举办实验幼儿园。金大农学院在温江、新都、仁寿等县建立农业推广示范区。小麦改良新种在四川被广为接受。燕大教授主持在成都广播电台开设“燕大学术讲座”。教育系在崇义桥夏家寺建立农村研究服务站，开农民识字班，小生产服务。五大学与基督教开展的边疆服务活动相结合在理县羌民中开展卫生、教育、农业事工。回校后齐大学生还连续两晚演出自编的番民生活话剧“日尔觉寨”。1943年五大学还组建了“儿童福利人才训练委员会”，开设儿童训练内容及管理。这些服务不仅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也促进了学生的成长，赢得了社会和政府的认同，加快了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进程。

第五，展开国际校际交流，使华西坝成为进行国际交往、交流的一个中心。教育学家马丁·特罗认为使大学处于“良性循环”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保持来往于名牌大学的学者络绎不绝；接待著名学者是名牌大学优于第二流院校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五大学同属于由外国学者首建的基督教大学，对外联络有丰富的资源。1937年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去英国留学访问，两次在牛津、剑桥发表对东西两大民族应对双方文化合作更进一步发挥与相互融贯之演讲。其后，牛津、剑桥分别由一批院长、教授相继成立了英中学术合作委员会，得到了国际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的盛赞，随即专函至华西坝五大学及中国其他大学，希望加强合作，并提出具体建议。在校方的支持下，罗氏联络了各大学专家、学者、社会名流，1941年11月19日正式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章程规定以“联络国内外学者，以客观的批判精神，探讨中西文化之价值，并直接交换思想，共同努力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社长罗忠恕，副社长金大倪青原，总干事何文俊，各大学的校长皆为名誉社员，延揽和聚集了国内外孔祥熙、张群、孙哲生、顾维钧、钱穆、施友忠、蒙文通、何鲁之、艾格斯顿、李约瑟、巴敦、达兹、齐尔门等许多知名人士；社员有各大学及学界知名人士48人。

学社定期举行座谈会并接待来讲学的外籍学者，如澳洲驻华公使艾格斯顿，牛津大学陶德斯，剑桥生物学、胚胎学教授李约瑟、印度的甘戈理、法国、波兰的学者、国内学者张东荪、梁漱溟等都来坝上讲学，进行交流。其他重要的国际交往有：1938年6月国际学联团长克鲁曼，团员傅路德、勒斯及雅德一行到来，在事务所与文化新闻教育界茶话会，克鲁曼发表了中国青年运动与世界青年运动的报告。1942年10月初，罗斯福总统派美国援华会名誉会长的温德尔·威尔基，为他的特别代表，访问成都，在坝上发表演讲。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访问成都，参观了中大医学院和金陵大学的农业展览，送了新种“华莱士瓜”。

1942年11月29日英国议会访华团由艾尔文爵士率领，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陪同来访，到华西坝参观，团员卫德波向3000听众发表《战后的问题》的演讲。1944年美国国务院驻华文化代表葛利石来成都举行座谈会，作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演讲。

开启了大熊猫外交史的大熊猫聚散中心。1938年3月纽约动物园协会理事迪安·塞奇提出，通过纽约大学与华西大学“合作”，“希望得到一只大熊猫幼仔，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一对幼仔。”“潘多拉”首次从华大送到了美国。1941年9月宋美龄、宋霭龄决定要送一对熊猫给美国，答谢美国救济中国难民协会的巨额经济援助，华大葛维汉先后从当地人手里买了两只大熊猫“潘弟”和“潘达”。11月6日由他亲自和布朗克斯动物园派来中国的约翰·蒂—范（John Tee-Van）一起送到重庆，11月9日在重庆举行隆重仪式赠送，蒋宋外交部长等人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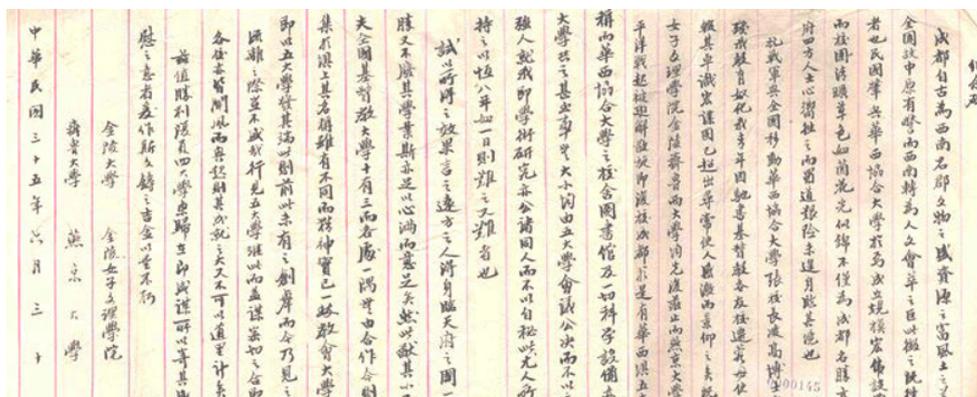
第六，提倡科学民主、学术自由，民主进步活动十分活跃。学生中自由结社的各种团契应运而生。随着抗战后期形势的发展，对国家民主进步的关心更为强烈。同学中各校有一些秘密的“读书会”，1944年华大组成由彭塞出面登记“时事研究会”，贾唯英与燕大刘克林发起的“未名团契”，随后相继成立的有“星星”、“协辉”等七、八个团契。1944年10月4日由“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的秘密小组发起，“时事研究会”等七个学术团体联合在体育馆召开了“国是座谈会”。接着成立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1945年五四青年节，108个社团联合召开了几千人的营火晚会，反独裁，争民主，成立联合政府。这些活动为不少学生奠定了那时的人生选择，虽然世事难料，终究为社会进步付出了努力。正如谢韬先生曾说：“我在华西坝度过了难忘的八年，那时的华西坝充当了中西方文化的结合点，培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综其上述，笔者感慨备至，曾有有【渔家傲】为记：协合门前江水绕，难中还看蜀山好。烽火北国才俊到。同执教，挽危唱响“渔家傲”。八载艰辛幽梦少，骄骢嘶啸催天晓。华西有缘追大道。胜利了，更知护守通灵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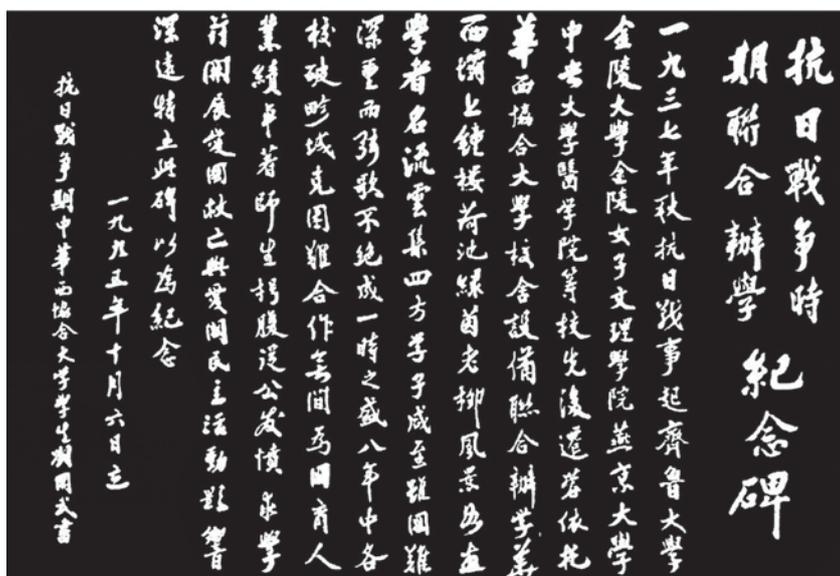
华西坝所展现的现代意识与辉煌，无疑是西学中的科学民主、基督教的博爱与中国传统的仁爱精神及民族觉醒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西学者与广大青年学生在中西融会、协合包容，修身利他、坚忍不拔的精神鼓舞下共同成就的。正如美籍学者戴谦和在坝上生活四十年回国前所说：我们回顾四十年来的变迁，不禁欢乐之极。我们曾联合中西同志，共同从事学术上之研究，以科学代替迷信，以友情代替歧视，以大同代替区域观念，以合作代替斗争，……我们仍抱着很大的希望”。

笔者无意中读到了原齐鲁大学学生王大空几十年后写的《齐鲁四年》中说：“华西坝的美不光是外在，主要是那些渊博的教授、勤奋的学生，使得这块土地盈满灵秀，充满生机。”不禁异常兴奋。便努力寻找有那些“渊博的教授”，“勤奋的学生”，进一步地探究他们走过的路。尽管无法穷其所有，但通过书刊、网络、

访问总算找到、汇集了425人。老师246人，中籍学者里，77%的是留学归来的，有两朝院士15人；学生179人，他们不只是接受一个大学的教育，而是几个大学最好的教育，7、80年代都是各专业的翘楚，有院士13人。无论师生当时在坝上作了些什么以及后来的走向与成就，展示他们曾聚集于华西坝，使华西坝及成都的文风为之一振。华西坝因他们而辉煌，值得热爱华西坝的朋友们品味与敬重。笔者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犹如一本好书，是可以对话的高尚者。通过对话能开阔思想的边界，完善自己的世界。同时借建校110周年之际向健在者问好，在已逝者的灵前献上一束花，感谢他们为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丰富华西坝文化的内涵付出的努力。但由于资料的欠缺，或者篇幅的限制，漏记的人和事，或者记述中有错。实属必然，期望更多的朋友发掘，补充、纠正、完善那个时代的故事，使华西坝文化更加丰富。



1946年四大学北归时留下的纪念碑



1955年75周年校庆时立的纪念碑